

真如丛书

妙灵·主编

徐清祥  
●  
著

# 門閼信仰

东晋士族与佛教



# 門閼信仰

东晋士族与佛教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门阀信仰：东晋士族与佛教 / 徐清祥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

(真如丛书)

ISBN 978-7-5004-8847-7

I. ①门… II. ①徐… III. ①政治制度 - 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9056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编辑 黄夏年

责任校对 周昊

封面设计 王华

技术编辑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95 千字

定价 2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中国佛教从印度东传以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绵延不绝。从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与格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初扬时期，其结果是以某一经论为核心而形成了部分学派；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成的阶段，华严、天台、禅宗等宗派的形成，表明了印度佛教在理论思想上的全部中国化。而宋元之际的佛教，又以禅、净为主流，进入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在民间发生了全面影响。到了明代，圆融的思潮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回归印度佛教的思潮，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为代表。今天，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思想、文化、学术之中，多元文化互相渗透，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有东西文化的辩论，中国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组。古老的佛教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继续传统、发扬光大，如何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当今佛教界的最大课题。

历史早已说明，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不可能超越于时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之外。虽然 20 世纪的中国佛教曾经面临着西方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在一大批高僧大德、檀那信众，以及社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艰难地度过一个世纪，现在正在朝着健康的轨道上运转。

佛教从来都是一个讲智慧的宗教，尤其重视智慧的解脱，在思想方面它曾经对中国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高僧大德、学士文人都非常看重义理的建设，他们撰述著作、注释经论，佛教的义理之学才得以发扬光大。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里所占的重要地位。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但是这一形式，又使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差异。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佛法还有自己的宗教性与神圣性。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对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些年佛教界一直忙着修复寺院、佛像开光、旅游接待，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同时，由于教界人才的凋零，青黄不接，兴办佛学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条出路。如今，二十年过去，人才紧缺仍然是佛教界的最大困惑。如何培养人才、引进人才，

是佛教发展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重要课题。佛教文化与文化的佛教是一回事，佛教文化需要现代化人才，文化的佛教也在呼唤人才的到来，佛教在社会的普及程度、观感，社会大众对佛教的理解水平，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真如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恢复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仍然有许多建筑需要修建。我主持真如寺以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四众弟子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果。但是，梵刹庄严，金像重光，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佛教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由于这一点，真如寺在经济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每周举办讲经活动、收藏名人书画、出版画册等等。

我于1944年出家，曾在上海佛学院读书，后来又在全国各大丛林参学。改革开放后，参与上海佛学院的工作，教书育人，一辈子都在从事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在寺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每周为信徒讲经，有时还到国内外从事一些弘法活动，闲暇之时，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文字因缘初衷不改，爱好佛教文化从未改变。

这次，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有意组织一套佛教丛书出版，旨在推进佛教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年老，但是对于佛教文化之事，亦不敢推卸，只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尽力促成此事。真如寺决定今后每年都将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佛教研究的事业，帮助学者出版有关佛学著作，鼓励法师、学者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为的是将中国佛学推向世界。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将佛教进行整体研究、契时而不过时，着重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1. 原始资料的建设：包括藏外文献的整理，重要文献的校注，近现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
2. 鼓励出版佛教研究的热点，同时加强资助目前中国佛教

研究的薄弱点：如戒律、清规、礼仪等。

3.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4. 国外优秀佛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发展佛教文化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恒心、愿心。真如寺一年资助四本书出版，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亦可成洋洋大观矣！滴水归海而不失，佛教的发展正是由点滴事情作起。只要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重视文化事业，专家、学者能够共襄盛事，佛教文化焉有不流传耶！

妙堂

2002年6月1日

于上海真如寺方丈室

# 序

近现代的中国，处在亘古未有之巨变当中，已经伴随了中国人垂两千年之久的佛教，也经历了它进入中国以后的又一次被发现、被审视、被评估（包括其自我发现、自我审视、自我评估）。佛教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的角色、地位、价值、作用，以及它同时作为变革对象之一的自我体认和自我调适等问题，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如此尖锐地摆到人们面前，成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尤其在实践上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一件大事。

这件事标志着一个历史的进程。这个进程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目的——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还没有最终实现，因为佛教能够适应和辅翊中国现代化的革命性转型还没有最终完成。何况，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上半叶提出的问题尚未回答和解决完毕之时，中国佛教又不断面临新的朝向、新的问题，这些朝向和问题是对以往的延伸和发展，是同一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们的出现，使已有的“百年沉思”越发显得重要，越发显得宝贵，也越发显得不足。

邓子美教授刚刚杀青的大作《超越与顺应——现代宗教学观照下的佛教》在此时问世，恰好给这“百年沉思”注入了一股清冽的活水，为所有关心中国佛教的时代命运、探讨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人提供了一条可以深入思索的新的理路。

这部著作的思想，早在 1994 年子美教授的《传统佛教与中



国近代化》一书自序中已见端倪。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间隙，运思不休，耕砚不辍，终于成此鸿篇。这可以说是他十多年来心血的结晶。全书体系博大，结构精审，视野广阔，立论严谨，而且似乎不是浅陋如我之流的随便什么人在开卷之初都能跟得上作者纵横挥洒的笔触。因此，我丝毫无意让这篇应命而作的小序承担导读的任务，更不敢在细窥全豹、悟得三昧之前就把它写成一篇书评，但匆匆归纳自己的感觉，子美教授的这部精心之作给我的启发至少有三点应该提及：其一在方法，其二在观点，其三在研究取向。三者书中相互关联，融为一体，概括说来，作者是将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导入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社会文化功能的历史考察和逻辑推演，力图指点读者逐步领悟：蕴涵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当中的某些精义，有可能像马克斯·韦伯所发现的基督新教伦理之于西方资本主义那样，在今天创造性地发展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化的精神力量之一。而在实现这个过程的同时，中国佛教的超越性品格将得到充分的萃集和彰显，其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表现方式，将在未来中国社会基本人文理念的构成中独树一帜，重新焕发东方生命智慧的光彩；作者在现代化焦虑和文化传统忧思交相萦怀的中国知识阶层乃至社会宏观管理阶层的面前拈出此一话头，深意殊堪寻味，且又谁曰不宜？作者并由此匡正了马克斯·韦伯对于包括佛教和中国儒教、道教在内的东方宗教的理解上的误差——这种误差与一系列不同凡响的见识一起，使马克斯·韦伯在这个研究侧面成为一位“伟大的外行”；人们不能绕过他或贬抑他，却可以去修正他、完善他、圆融他。但是，做到这些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应该像子美教授一样的功力、勤奋和须臾不可或缺的使命意识。

子美教授把自己在书中做的工作归之于中西宗教学术交流的范畴，其实，他的研究的首要意义在于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宗教学界正在形成的共同取向，即吸收借鉴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成果，用

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民情下的宗教形态的研究，建构符合中国宗教历史面貌、文化特质和存续规律的宗教学话语系统，从而丰富和扩大世界宗教研究的宝库，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服务。这当然是一场长久的中西宗教学术交流和对话，在如此的背景和旨趣之下开展起来，持续下去，国际学术殿堂上中国学者的身影必将越来越清晰，声音必将越来越响亮。子美教授和他的这部《超越与顺应》，连同近些年来不少学界同仁和他们的著作，已经并且不断地给我们增添了这样的信心。

我甚至有一个想法，中国学者像本书一类的著作，应该有组织地被译成外文（特别是英文），以便让西方的宗教学者更准确、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的中国同行所从事的志业。

我与子美相识有年，他为人敦厚笃实，真诚谦逊，富于才华而甘于淡泊，惟学问与深思是求。像他这般兼具“学究气”和“君子风”的纯然一介书生，方今之世，怕是不可多得了。去年我们同到台湾开会期间，蒙他谬托，要我为其新著撰“序”，我踌躇再四，无法推辞，只得忝颜勉为其难。虽然走笔至此不知所云，但最后有一句话还是能说清楚的：希望子美兄按照自己的研究计划，再接再厉，写出更多像本书一样有分量的大作！——我以为，懂得你的情怀并期待于你的，绝不止是学界二三子而已。

张新鹰

甲申春节于北京寓所

# 目 录

导 论 .....	( 1 )
一 研究的对象 .....	( 2 )
二 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7 )
三 研究的文献与方法 .....	( 11 )
第一章 东晋出家士族考	
——兼论士族身份的变化 .....	( 14 )
第一节 门阀制度与士庶划分的标准 .....	( 14 )
第二节 北方士族出家考 .....	( 25 )
第三节 南下士族出家考 .....	( 32 )
第四节 士族身份的变化:从圣人之徒到方外之宾 .....	( 46 )
第二章 儒玄士族与佛教(上)	
——兼论两晋士族信仰的变迁 .....	( 56 )
第一节 琅邪王氏 .....	( 56 )
第二节 陈郡谢氏 .....	( 74 )
第三节 太原王氏(一)——王昶一支 .....	( 83 )
第三章 儒玄士族与佛教(下)	
——兼论两晋士族信仰的变化 .....	( 94 )
第一节 太原王氏(二)——王默一系 .....	( 94 )
第二节 颍川庾氏 .....	( 101 )
第三节 谯国桓氏 .....	( 112 )

**第四章 礼法士族与佛教**

——兼论两晋士族责任的变化 ..... (126)

第一节 何曾、江统合论 ..... (131)

第二节 卞壺与蔡謨合论 ..... (137)

第三节 徐邈、范宣、范弘之合论 ..... (142)

**第五章 东晋建康佛教与士族**

——兼论佛教的合法性问题 ..... (145)

第一节 公元317年至342年 ..... (152)

第二节 公元343年至372年 ..... (159)

第三节 公元373年至420年 ..... (187)

**第六章 东晋会稽佛教与士族**

——兼论佛教的庄园经济问题 ..... (212)

第一节 佛教传入的时间与北方士族迁入的时间 ..... (218)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门阀庄园 ..... (228)

**第七章 东晋僧团与士族**

——襄阳、庐山合论 ..... (244)

第一节 襄阳僧团 ..... (247)

第二节 庐山僧团 ..... (261)

**第八章 文化问题与流民问题**

——论东晋士族与佛教的关系(上) ..... (276)

第一节 建康 ..... (278)

第二节 襄阳与庐山 ..... (286)

第三节 会稽 ..... (291)

**第九章 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

——论东晋士族与佛教的关系(下) ..... (297)

第一节 族群信仰与个体信仰 ..... (299)

第二节 养生送死与内圣外王 ..... (320)

第三节 与化同体与生死涅槃 ..... (330)

---

第四节 把人生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来 .....	(351)
主要参考书目 .....	(355)
后    记 .....	(362)

## 导 论

1940年春，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中，有一段重要谈话：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sup>①</sup>

关于“补前修所未逮”，各领域、各学科，各有不同。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三教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一项。这一点，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有明确的论述：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又言：

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

---

<sup>①</sup>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成系统而多新解。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近日常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东洋文库本），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之追补者也。<sup>①</sup>

全面、系统地研究三教关系，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造成这项任务长期无人完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积累不够，现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未达到可以系统研究三教关系的程度；二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很不成熟，远未形成全面总结传统文化所需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

本书选择“东晋士族与佛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目的是明确的：即从一个侧面研究三教关系，并且明确限定在东晋儒佛二教的关系上，完全可以视为三教关系的子项之一。至于意义，意在补前修之未逮。东晋政治，祭在司马，政在士族。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占有主导地位，没有士族的支持，佛教在中土晋民之中要立足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就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言，士族与佛教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

## 一 研究的对象

本书既不单纯地把东晋士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不单纯地把东晋佛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在“与”字上下工夫，

<sup>①</sup>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2—283页。

把东晋士族与佛教的相互交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东晋士族与佛教的交涉，二是东晋佛教与士族的交涉。前者交涉的主体是士族，客体是佛教。后者交涉的主体是东晋佛教，客体是士族。把握交涉的主体，是研究的关键。

士族，首先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现象，它是建立在门阀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身份制度。士庶之分，贵贱之别，在选举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徭役制度、占田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社会交往和文化礼仪、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十分严格的、非常硬性的规定，不遵循这些规定，后果是严重的。在东晋士族与佛教的交涉中，总有一部分士族改变身份，出家为僧。那么，他们出家的原因是什么？地点在哪里？时间具体在何年？归依的法师是谁？这些问题都是研究的内容。此外，这些士族身份的僧人与庶民身份的僧人，在僧团中所起的作用有何不同？所具有的地位是否有别？这些也都是需要考察的问题。

其次，士族是有思想信仰的。作为学术文化的承担者，与“愚夫愚妇”不同。“愚夫愚妇”与天地同德，但“日用而不知”；士族则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或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and 实践。以学术见长，人生具有自觉性，是士族区别于庶民的一大特点。一般说来，士族总是服膺礼教的，就是那些反礼教的名士如嵇康，依照鲁迅的观点，骨子里也是信仰礼教的。两晋之际，士族在思想信仰上出现了分裂，有出入儒玄的“新族”，也有信守礼法的“旧族”。一般说来，在政治与文化上得势的还是前者。认真考察两晋士族的思想信仰及其与佛教的交涉，是本书的内容之一。而对出儒入玄士族的考察，无疑具有典型意义。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士族开始与佛教有了交涉？其原因与结果是什么？其内容与性质如何？哪些士族在什么时候才真正变为



佛教的在家信徒，士族由儒入玄，由玄入佛，有没有表现出规律性的东西？

最后，士族是负有责任的。国家在赋予士族特权的同时，也把责任托付给他。士族的责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责任；二是文化责任。《孟子·梁惠王下》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古文尚书·泰誓上》孔颖达疏曰：“治民之谓君，教民之谓师。君既治之，师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师。师谓君与民为师，非别置师也。”三代治教、官师合一，士大夫莫不一身充二任，一职充二任，即一个人一个职务（官爵）具有治民和教民两种责任。后来治、教相分，不能合一，就产生士阶层的分化：一部分专门从事政治职能（官吏），一部分倾向于文化职能（文士）。《荀子·子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礼记·儒行》：“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文化责任高于政治责任，这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当然也是士大夫的共识。后汉以降，士与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大批既有学术实力又有政治实力的士家大族，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门阀制度。士族，不作为单士，而是作为家族，既承担着政治责任，又承担着文化责任。我们要考察的是：士族在与佛教交涉的过程中，他们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是否发生变化，并且他们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在与佛教的交涉中起了什么作用？

关于东晋佛教与士族的交涉，首先要考虑佛教的地域性。佛教和其他的宗教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像哲学思想，可以存在于个别天才的大脑里、书斋里或文献中；作为社会现象，佛教必然是存在于信众之中，而不同地域的信众各有特点，这就使得不同地域的佛教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在一定的意义上，